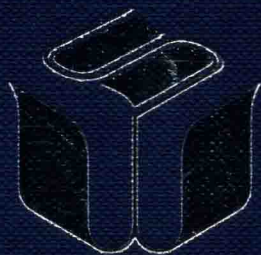


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

教育卷

总主编 张建华 薄音湖
本卷主编 王风雪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

教育卷

总主编 张建华 薄音湖

本卷主编 王风雷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教育卷/王风雷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3.7

ISBN 978-7-5665-0308-4

I. ①内... II. ①王... III. ①文史-内蒙古-文集 ②地方教育-教育史-内蒙古-文集 IV. ①K292.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71080号

书 名	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教育卷
主 编	王风雷
责 任 编 辑	张 志
封 面 设 计	教全英
出 版	内 蒙 古 大 学 出 版 社 呼和浩特市昭乌达路88号(010010)
发 行	内 蒙 古 新 华 书 店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44.25
字 数	1077 千
版 期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665-0308-4
定 价	2160.00元(全十二册) 本册定价:180.00元

声 明

我社已将出版《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的使用情况备案到内蒙古自治区版权保护协会,因无法与作者取得联系,特委托内蒙古自治区版权保护协会代转作者稿酬,并依照《著作权法》相关规定及国家版权局制定的稿酬标准支付稿酬。

联系电话:0471—4967453

《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编委会

主 任：布小林

副 主 任：张建华 冯永林 孔令勋

门百岁 马庆生 薄音湖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风雷 巴特尔 石玉平 包斯钦 乔 吉 刘国辰

李晓秋 连吉林 何远景 张久和 陈永志 明 锐

赵 英 莫久愚 鲍·包力高

总 主 编：张建华 薄音湖

副总主编：孔令勋 何远景

本卷主编：王风雷

编务主任：李鲁一 周绍慧

编 务：萨如拉 周秀峰 边保应 段瑞昕 冯丽丽 李 倩

门 洁 胡 静



《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

- 《历史卷》 主 编：薄音湖
- 《历史地理卷》 主 编：莫久愚
- 《文物考古卷》 主 编：陈永志 连吉林 副主编：娜仁高娃
- 《语言文字卷》 主 编：鲍·包力高 巴特尔
- 《民族卷》 主 编：张久和
- 《宗教卷》 主 编：乔 吉
- 《民俗卷》 主 编：刘国辰
- 《教育卷》 主 编：王风雷
- 《艺术卷》 主 编：冯永林 副主编：冯丽丽
- 《人物卷》 主 编：何远景
- 《文学卷》 主 编：包斯钦
- 《文化卷》 主 编：明 锐 副主编：何励蓉

序

中华文化是多元文化的统一,作为其重要一元的草原文化,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适应草原生态环境,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创造和积累下来的一种文化形态。随着大量的考古发现和对历史文献的深入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流,三种文化的相互碰撞、交流、融合,共同造就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内蒙古是草原文化的主要发祥地。曾经生活在这里的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草原文化,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这里有大约5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的大窑文化、萨拉乌苏文化遗址,有1万年前的扎赉诺尔人。新石器时代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等人类文明结晶,拓展了中华文化起源,把中华文明的开端推向更为久远的历史,被称为“中华文明的曙光”。人类步入文明社会后,蒙古高原的统一,彻底打破了区域之间的封闭,打破了原有民族、部族的格局,结束了蒙古高原数千年民族、部族纷争的历史,在建立政权、创造文字、建设都市、繁荣文学艺术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非凡的成就,涌现出了一批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文学家。作为中华文化重要源流的草原文化,在不断地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和中华文明的繁荣提供滋养的同时,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依然生机勃勃,独具魅力。

马克思曾经说过,“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它反映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不断推进文明进步的历程。今天的世界是过去世界的继续和发展,如果隔断历史,就不能全面地、正确地理解现实和展望未来。”在当今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突显的时代,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对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和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存史的目的在于资政,在于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推动社会进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要重视对历史的学习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运用。”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顺应时代和社会需求,组织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和资源,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历时三年之久,编纂出了一套共计1000余万字、7万余条文献目录的《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全套丛书共12个分卷,集辛亥革命以来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成果之大成,涵盖了历史、教育、地理、民族、宗教、民俗、文化、艺术、人物等诸多方面,为社会文史研究工作者和广大读者提供了一部内容丰富、翔实的史料。在这套详前史之阔略,补今史之空白的卷帙浩繁的《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付梓之际,谨向参与编纂的学者表示祝贺和敬意。

80 多年前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中说,“我国史界浩如烟海之资料,苟无法以整理之耶,则诚如一堆瓦砾,只觉其可厌;苟有法以整理之耶,则如在矿之金,采之不竭,学者任研治其一部分,皆可以名家,而其贡献于世界者皆可以极大。”加强对草原文化的挖掘、整理和研究,传承和弘扬优秀文化,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将是我们孜孜不倦共同追求的事业。

美丽和谐的内蒙古,不仅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内蒙古,也必定是一个文化繁荣的内蒙古。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布小林

2013 年 7 月

前 言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中华版图的正北方,国土面积 118 万平方公里,东西横跨东北、华北、西北,毗邻八个省区,北部与蒙古、俄罗斯两国接壤。千百年来,她以博大的胸怀,造化万物,包容百态,辈出英才,力鼎时代,以其中北方民族特有的传承演进方式,创造了地区人类历史发展的文化与文明。

纵观辛亥革命以来国内外文史研究成果,内蒙古所占的比重与影响,堪称厚重久远。时至今日,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正在携手铸就着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恢宏。更应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文弘世道,史为国鉴之道理,越来越深入人心,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把握国家和自己的命运的取向,已成为推动当今社会进步的一种先进生产力。说古论今,引经据典等不凡其例,可谓存史资政。

文史研究馆作为政府文史咨询职能部门,理应为之需求提供服务。于是,我们从 2011 年开始,着手收集整理起迄百年来专家学者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研究内蒙古地区人文社科类的论文和著述,编纂了这部《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旨在为人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内蒙古历史提供方便。全书共分设历史、文物考古、历史地理、民族、宗教、文化、教育、艺术、文学、语言文字、民俗、人物等十二卷,共计 1000 余万字。

历史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历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民族、民俗等方面。

文物考古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文物考古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辽西夏金元、明清等时期内蒙古大地上的出土文物、遗址考古等方面。

历史地理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道路交通地理、城市城镇(城址)地理、军事地理(长城、关隘、驻防设置)等方面。

民族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民族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曾经在内蒙古地区生产生活、繁衍生息的北方各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融合演进的过程以及推动近代以来民族关系发展的政策、制度等方面。

宗教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宗教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蒙古族的古老宗教——萨满教,大蒙古国时期的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道教全真派以及外传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元朝时期佛事活动、佛经翻译与寺庙等方面。

文化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广义文化、狭义文化以及对内蒙古地区文化成果评述等方面。

教育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科举制度、官学教育、私学教育、幼儿教育、民族高等教育、教育制度演变、书院、学校创办等方面。

艺术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艺术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传统与现代艺术领域里的诸多方面。

文学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文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小说、散文、诗歌、史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乌力格尔等方面。

语言文字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北方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蒙古方言土语研究、蒙古语语音、语义、语法、词汇等方面。

民俗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民俗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有史以来繁衍生息于南起长城、北抵大漠、东达兴安岭、西越贺兰山的苍茫大地上,举凡衣食住行、乡社生产、市井商贸、宗族村落、人生仪礼、游戏娱乐等方面。

人物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为推动和影响内蒙古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历史人物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

在编纂上述十二卷的同时,我们还编辑了《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附录卷,纳入通览体系,以目录的形式收录未选入上述十二卷文章的名称、作者与出处。

《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计划在“十二五”期间完成。2013年先期出版六卷。在编纂出版过程中,我们力图通览,求所精华,注重学术,尊重历史,面向未来。但由于时间紧迫,加之水平有限,在通览结构划分上、体例确定上、目录和文章的选辑上以及文稿校对上,难免存在疏漏和不足,恳请批评指正。

《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的编辑出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此,我谨代表内蒙古文史研究馆向参与编辑出版此书的同仁表示感谢,向所有提供文章的作者表示感谢。

我们热爱内蒙古,不仅仅是因为生于斯、长于斯,更因为这里蕴藏着富集的物质资源与丰厚的文化宝藏。文史研究馆所能做的,并能做到、做好的事情,就是让这些丰厚的文化宝藏再现光辉,让更多的人了解内蒙古、了解内蒙古文史研究百年来的发展与成就,并为之所用。

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馆长 张建华

2013年6月10日

蒙古族教育研究综述

纵观学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蒙古族教育研究异常活跃,而且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与蒙古民族相关的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教育之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为我们深入了解其教育,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要说蒙古兴起前北方游牧民族的教育,首先必须提到匈奴人的教育,因为该民族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金戈铁马的匈奴族,给后人留下了很多不解之谜。同样道理,他们的教育也带上了一些神秘的色彩。不过,随着研究工作的逐级深入,一些未知领域的轮廓变得清晰,显现出庐山的真面目。匈奴的教育大多都表现为广义的教育,与该民族的生产、生活联系在一起,形成了立体的多元教育。如果说得具体一点,那就是在生产劳动中融入了教育,在生活实践中渗透了教育,而且具有很高的自由度。另外,匈奴人的军事教育特别发达,所谓“控弦士三十万”就说明了这一点。沙场上的杀戮练就了匈奴的铁骑,也正是这一优胜劣汰的法则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英雄豪杰。匈奴人的音乐舞蹈教育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他们所具有的乐器以及能歌善舞的个性,都是一个有力的佐证。在当时匈奴人已经开始使用了文字,一方面我们不排除他们使用汉字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匈奴人拥有文字的可能性。后来南匈奴在与汉人接触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汉文化,其教育开始出现了汉化的特点。

乌桓、鲜卑是继匈奴后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民族。他们的教育与匈奴的教育具有相近或相似的特点。需要指出的是,学界对乌桓、鲜卑的教育也进行了较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遗憾的是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们未收录相关的研究成果。然而,在综述中还有必要提及这方面的内容。说起乌桓的教育,他们是一个崇尚英雄的民族,而英雄人物的成长过程与军事技能的训练和掌握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军事教育是每一个男儿必须接受的教育,而且带有普及型的特点。在乌桓人的家庭里,母亲具有崇高的地位。与之相适应,在子女的教育当中,母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是乌桓人家庭教育的一大特点。另外在乌桓人

的教育当中,习惯法占有重要的位置,而且形成了人们必须予以遵守的行为准则。在此基础上,科技,如天文、农业、医学等内容的渗透,使得乌桓人的教育变得更有特色。

学界对鲜卑教育给予了高度重视,进而发表了好多研究成果。鲜卑人入主中原之前较多地保留了自己的传统文化,而后逐步向汉文化靠拢,最为典型的是,前燕、后燕、南燕时期的慕容鲜卑的文化就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汉化倾向;后来到了北魏孝文帝时期政府所采取的激进措施使得鲜卑人彻底放弃了本民族的文化,进而加速了本民族文化自我毁灭的步伐。对于这一点,后人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认为这迎合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但也有人认为北魏孝文帝上演了一场文化毁灭的悲剧。笔者以为,后者的评价也有一定的新意,至少不是人云亦云,尤其对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具有积极意义。早期鲜卑人的教育与乌桓相近,游猎生活提升了鲜卑人与军事斗争相关的耐力和素质。南进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西迁的吐谷浑人则更多地保留了传统的生活方式,而且通过征战提高了军队的作战能力。建立北魏的拓跋鲜卑在教育上高举儒学的大旗,建立健全了一整套教育体系,促进了教育的发展。这种发展首先表现在北魏皇帝及宗室子弟的教育水准得到了全面的提升,这在史书上都有明确的记载。可以说,他们醉心于汉文化,甚至都达到了学者的层次,普通人无法与之相提并论,著书立说者大有人在。据说孝文帝元宏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这些记载足以证明他的学识和功底。北魏的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以及私学都得到了较好的发展,进而达到了一个完备的程度。北魏的音乐教育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时人编创的一些精品力作,如《阿干之歌》等早已载入了史册。据载,鲜卑人较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字,而且留下了一部分著作目录。这说明当时的鲜卑语教育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层次。就是在孝文帝实行改革之后,南进的一部分鲜卑人仍在说鲜卑语,这在一些人的家庭环境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基本上都用鲜卑语进行交流,而不是用汉语交流。不过这或许是一种小范围的过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少了。

学界对柔然的教育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因而研究成果并不多见。笔者以为,柔然的教育仍具有典型的游牧色彩,因而生计或生存教育具有普遍意义。恶劣的环境促使人们必须学会应对现实,掌握生存的本领。例如耐寒的本领和驾驭野马的能力,还有捕获猛兽的本领都必须从小培养,否则只能被自然淘汰。当然,他们还必须掌握一些生产劳动的知识技能,这都是生活所必需的东西。在柔然人的教育当中,传统习惯占相当大的比重。收继婚习俗的传承就说明了这一点。实际上,收继婚是北方游牧民族所共有的习俗,早期的匈奴、东胡、乌桓、鲜卑都有类似的习俗,就是到了元代,蒙古人仍遵循着这一古老的习俗。这一点与农耕民族的伦理习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这也成了农耕民族向游牧民族发难的焦点。柔然人的语言文化教育也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在汉籍里记载了好多柔然语,遗憾的是要解读它需要多方面的素养。在与北魏交往的过程中,柔然人也培养了一部分口译人员,进而实现了双方的顺利沟通。据载,柔然有自己的文字,但有些问题还不是十分清楚。另外,柔然人所崇信的巫觋,对民间文化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很多场合他们扮演了一个医师的角色。

至于突厥的教育,在很多方面与上述的几个游牧民族的教育比较接近,尤其在生产、生活以及习俗等方面具有好多共性的东西。突厥对中国及世界的影响力不亚于匈奴和鲜卑,尤其是他们创制并使用的文字,为我们研究其教育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目前直接研究突厥教育的文章和专著并不多见,然而有些零散的研究散见于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的论著

当中。其实突厥人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使用自己的文字。关于突厥文字的情况,在汉籍里都有明确的记载,而且时人也用突厥语翻译过《涅槃经》,遗憾的是这些问题没能引起学者的重视,让它沉寂了1300多年。1889年,俄国牙德林采夫在鄂尔浑河流域发现了《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1893年,丹麦学者汤姆森解读了这两块古突厥碑的碑文,到了这个时候人们才揭开了这一死亡文字的神秘的面纱。有幸的是,2012年10月初,笔者前往蒙古国鄂尔浑河流域进行了学术考察,而且专程到土耳其出资建造的和硕柴达木博物馆,亲眼目睹了历经沧桑的《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此情此景,让人抚今追昔,感慨万千。的确,古代游牧民族为我们留下的遗产不仅仅是横刀立马的武功,而且在文化教育方面也留下了难以估量的财富。现在我们所挖掘出来的只不过是九牛一毛,海水一滴,因此需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之后发现的突厥文碑,都说明了这一点。古突厥人在文字的使用方面,还与粟特文和吐火罗语产生了密切的关系。该民族在北中国同汉民族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方面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因而他们的教育是多元的,也是开放的。突厥人的音乐、舞蹈、体育对汉民族形成了强有力的视听冲击,并且为中原文化注入了强有力的生命力。突厥也是一个崇尚英雄的民族,他们重兵死、耻病终的习俗很能说明问题。另外他们旗纛之上施金狼头的习俗有力地强化了男子汉大丈夫应具有狼性,要求每个人在战场上像狼一样冲锋陷阵,勇往直前。值得一提的是,在古突厥人当中,民间谚语的教育占据了相当大的分量,而且对文化的传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突厥的衰落使得回鹘(或回纥)成了蒙古高原上的霸主。与登上历史舞台的游牧民族的教育相比,回鹘(或回纥)的教育既有共性的一面,也有其独特的一面。从游牧到定居,然后建造都城的这一发展过程,使得回鹘人的生产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内容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对手工业生产者和商人的需求在客观上刺激了相应教育的发展。纵观回鹘人的宗教信仰,起初他们崇信萨满教,之后在其民众当中摩尼教、佛教、景教、袄教、道教都有一定的市场,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他们的宗教信仰最终稳定在了伊斯兰教。特殊的地理位置,再加上多元宗教的盛行,这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回鹘教育多姿多彩的风格。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佛教能够在蒙古高原上得以传播,回鹘僧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佛经的翻译方面回鹘僧功不可没。史实证明,后来的契丹、党项、女真等游牧民族基本上都通过回鹘僧得到了佛教的真谛。回鹘文字的变动比较大,按顺序来讲他们先后使用过突厥文、粟特文、回鹘文、摩尼文、叙利亚文、婆罗米文、阿拉伯文等,此外汉文、契丹文、西夏文对他们也有一定的影响。所有这些对研究该时段的文化教育增添了许多困难。不过,无论怎么变,其发展的脉络还是比较清晰的。回鹘人的文学艺术和科技对他们的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乌古斯汗的传说》、《福乐智慧》、《真理的入门》等名篇巨著,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回鹘教育思想的精华,同时也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文化遗产。在此基础上,回鹘人的音乐舞蹈,还有视觉艺术都达到了顶级水平,进而向人们展示了与之相关教育的风采。另外回鹘科技教育主要还是以医学为主,回鹘文医学残卷——《杂病医疗百方》证明了这一点。当然回鹘人的古城遗址,还有考古发现也集中反映了他们的科技及其教育所达到的那个水平。

契丹称雄蒙古高原数百年,创造了灿烂的教育文化,他们无论是对本族教育发展,还是对异族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一个游牧民族的契丹人建立政权以后,首先在传承本民族文化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为此他们创制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而且建立健全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契丹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的契丹人才。关于契丹大小字的解读工作取

得了重大进展,总的来讲,该语言与蒙古语和达斡尔语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有人认为它是极端腭化了的蒙古语。事实上北方游牧民族的语言有好多共性的一面,有些词汇是通用的。可汗、可敦、土门等词,就是很好的例证。契丹(或曰辽)的教育发展的一个标志是,高丽方面曾经数次选派一定名额的学员来到辽的都城接受教育,这说明在当时辽的学校教育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否则高丽不会选派留学生的。毫无疑问,高丽学员把学习的重点放在了契丹文上,从中获取了文化营养。后来高丽人创设的司译院就能说明问题。因此,高丽人对外来文化的学习是比较开放的,封闭的问题是不存在的。契丹统治者对汉文化教育的发展也给予了高度重视,结果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儒学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而且与宋境内的儒学形成了比翼齐飞的态势。契丹统治者为了发展儒学,他们还实施了科举考试录用了大量的统治人才,并为之后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实行文治提供了参照。有意思的是,辽代的科举考试当中,有好多契丹等游牧民族出身的士人及第,开创了科举考试的先例。无论是辽代的教育,还是契丹的教育,契丹贵族阶层的教育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太子的教育特色鲜明,成就卓著,尤其在辽汉双语教学方面为我们提供许多成功的经验。除此之外,契丹宗室成员们通过教育实现了文武兼备,留下了好多佳作,丰富了契丹文化的内涵。另外契丹女性的教育也非常突出,涌现出了一些能够数得上的巾帼英雄。与之前的游牧民族相比,契丹人的音乐教育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其国乐、诸国乐、雅乐、大乐、散乐、鼓吹乐、横吹乐都成为丰厚的文化遗产。契丹人的筵席是一个艺术盛宴,除了音乐舞蹈,北方游牧民族的诗歌——祝赞词得到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契丹或辽代的医学和天文历算教育,也显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为之后的金元奠定了基础。耶律大石创建的西辽政权,在客观上把东方的文化带到了中亚,同时也为当地的教育带去了新鲜空气。因此在西辽既有土著居民的教育,也有契丹和儒学教育,形成了一个多元体系。随着契丹字的被解读,其教育之谜也将逐步大白于天下。

学界对党项(唐兀惕)教育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蒙古灭西夏以后,唐兀人及其文化似乎是销声匿迹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学界对唐兀人的去向进行了追踪,而且有了很大的收获。史实和研究表明,党项人在教育方面也建立了不少丰功伟绩。西夏党项文化教育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起初他们的教育也比较原始,这与他们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相吻合。不过他们的尚武精神和敢于战斗的气势,把一个弱小的部落引向了强军立国的道路。蕃书的创制使党项人的教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实现了一个新的飞跃。野利仁荣是党项教育的祖师爷,正是他在元昊的授意下创制了蕃书后,在文字的推广应用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西夏的蕃学与蕃书是一个密不可分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当时从国都到州县都建立了蕃学,促使党项文化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与此同时,从当时的实际需要出发,党项统治者与中原王朝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因而他们在文化教育方面对儒学给予了高度重视,儒家的经典文化成了教育的主要内容。统治者用良马换取《九经》、聘请师儒的记载,不绝于史书。与儒学教育相适应,蕃汉双语教育成了党项教育的一大特色。韩道冲等学者翻译的儒家经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为了便于蕃汉翻译,骨勒茂才所著的《蕃汉合时掌中珠》成了一绝。这既是一部蕃汉双语教材,也是一部解决燃眉之急的工具书。党项统治者实施的科举考试,培养造就了许许多多的进士,甚至有些人成了千古名臣,其中高智耀就是一例。党项人的佛学教育及佛经翻译创造了许多辉煌,也为后人留下了好多精神财富。《西夏译经图》为我们了解当时的教育和文化盛况,提供给了

视觉资料。需要指出的是,西夏文佛经有些是通过汉文进行翻译的,而有些则是通过回鹘僧、西蕃僧和天竺僧翻译的。随着大量蕃书的面世,这些问题变得更加明晰。笔者以为,《天盛律令》反映了当时的道德与法律教育;另外,党项人的音乐和医学教育也都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层次。

学界对女真教育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女真人通过武力取代契丹以后,在文化教育方面也有很多建树。事实上,女真人在建立国家统治百姓方面,从契丹那里继承了很多遗产,并且进行了发扬光大。可以说,他们所实施的政策法规大多源自于契丹,深深地打上了前朝的烙印。就拿女真文字的创制来说,他们基本上是照搬或照抄了契丹大、小字的模式,而且印记特别明显。女真人的文化教育政策,本质上也是契丹文化教育政策的翻版,只不过是契丹被替换为女真罢了。1119年,金太祖命完颜希尹创制了女真大字,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普及推广,为此创字者作为女真族的大学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也因此成了女真学校教育的师祖。游牧民族的游牧性,表现在他们所采用的文字也具有不定性的特点。对此,突厥、回鹘、契丹都具有类似的特点,到了女真时代他们也受其影响,仅仅过了20年,女真人又创制了女真小字。为了普及女真文字,政府在全国各地都设立了女真学,进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和传承了本民族的文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他们用本民族文字翻译了《贞观政要》、《白氏策林》等汉籍,作为女真学子们的学习教材。与此同时,女真统治者对各地的儒学给予了高度关注,他们高举孔孟之道的大旗,竭尽全力为儒学的发展提供方便。在发展汉地儒学的同时,女真统治者也全方位地实施了科举考试,录用了大批进士,提升了官僚队伍的素质。女直、汉两种体系的考试,为元代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的分榜科试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当时女真教育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一方面突出了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教育,另一方面兼顾了汉语言文字教育,在此基础上更注意了契丹语言文字学习,结果是涌现出了一大批精通辽、汉、女真语言文字的人才。种种迹象表明,辽亡以后,他们的文化不但没有立刻消亡,而且形成了与女真王朝共生存的态势。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说明教育的功利性显得十分微弱,而且统治者的宽容也到了超乎寻常的程度。这就是草原民族应有的胸怀,他们没有因另类文化的存在而对其采取封杀的措施。为了提高自身素质,女真宗室或曰完颜家族在其子女的教育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后继的王朝树立了榜样。然而,教育使得宗室子弟们的母语能力有了明显的下降,完颜雍对此有所察觉,因而反复强调必须加强女真语言文字的学习。这说明在当时的宗室成员当中,弃女真字而学汉语的现象十分严重,对此女真最高统治者所采取的纠错措施,为当今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操作模式。史实证明,金世宗完颜雍是一个大教育家。他所倡导的尚俭创业教育、忠孝仁德教育、知行统一教育、女真文字教育、实际磨练教育、女子教育、音乐弓箭击毬等对完颜家族后裔的成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更可贵的是,完颜雍对教育的研究并未停留在理论上的阐述,而是更多地关注了实践,把它落实到了实处,进而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除此之外,女真统治下金代的农业教育、天文历法教育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之相适应,金朝政府顺应教育发展的规律,构建了一个高质量的医学教育体系,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有影响的医师,为元代医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与其他时期的音乐教育相比,金代女真及其他民族的音乐文化及其教育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且对蒙元时期音乐文化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蒙元时期的教育研究进一步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从而确立了其在中国教育史上所占据的历史地位。

学界对蒙元时期蒙古族教育的研究异常活跃,好多未知的东西逐步趋于明朗,比较客观地展现在了世人面前。

首先蒙古帝国的教育,甚至较早时期蒙古人的教育,零零散散地见诸于《蒙古秘史》。而这种教育同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混杂在一起,很难进行严格的划分。蒙古少年从其出生的那天起,跟着父母牙牙学语,而后追逐牛羊开始在马背上颠簸,学会了放牧的技艺。这个时候,蒙古人最看重的是团结合作教育,阿阑豁阿五箭训子的典故,还有库歹彻辰对俺巴孩可汗的十名儿子的教训,都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纵观统一前蒙古各部的教育,尤其是在一个家庭里,母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阿阑豁阿额客、诃额仑兀真、孛儿帖夫人,还有唆儿忽黑塔尼别吉的教子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古代蒙古人还有特殊教育的习俗,那就是他们的长者向其子女讲述祖先系谱的传说,而且让他们永远牢记,终生不忘。正是这一口耳相传的形式,保留了大量的文化。当然《蒙古秘史》还向人们传递了蒙古少年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此外还透露了女性、音乐、医疗、道德、军事等教育的诸多信息。

在蒙古帝国时期的教育当中,成吉思汗的教育思想占有独特的地位。研究表明,成吉思汗是一位大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政治军事活动当中,也体现在他的圣旨、法令、必里克训言当中。他在军事理论教育、法制教育、伦理纲常教育、团结合作教育、女子教育、巩固政权教育、创业教育、意志的磨练等方面都有独特的建树。成吉思汗的人生轨迹本身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教科书,不仅对蒙古民族,而且对全人类都成为一个永恒的训诫,进而对后世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当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韩国的一些学者为了鼓励企业度过暂时的困难,以成吉思汗的名义向年轻人写了两封信。大概意思是说,眼前的金融风暴算得了什么?当年我为了创业,妻子被敌人抢去遭受了莫大的侮辱,正因为如此连带出了长子。为了创业我把头颅跨在了马背上,把鲜血装在了皮囊里,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总之,成吉思汗发来的两封信情真意切,深入人心,对韩国青年形成一个莫大的鼓舞,使他们勇于面对现实建功立业。成吉思汗所说的“你们要勇攀高山之巅,冲向大海的渡口,不要因路途遥远而踌躇,只要走就一定能够走到。不要因担子重而畏缩,只要扛就一定能够举起来”训言,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

畏兀字的应用与教育具有密切的关系,大蒙古国需要一定数量的文职人员,因而开始有专人向年轻一代传授这种文字。蒙古人开始借用畏兀字书写国言以后,塔塔统阿就成了史上第一任八合识——教师。在太子诸王当中,失吉忽秃忽较好地掌握并精通了畏兀字。他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在实践中发挥了一个八合识——教师的职能。窝阔台和贵由在位时期,精通畏兀字及其他语种的大必阁赤镇海(汉人称他为中书丞相)也扮演了类似的角色。

随着蒙古帝国版图的扩大,各色人种间的交流变得十分普遍。这在客观上就需要一批甚至是一大批口译人员——怯里马赤,而远距离交流则需要更多的笔译人员——必阁赤。

各种翻译促使蒙古帝国的译史教育分成了两个层级:一为口译人员的培养,二为笔译人员的培养。无论哪一层级的译史,都必须精通多种语言,否则很难适应社会的需要。可见,译史的培养成了那一时期的一种特殊教育。

大蒙古国统治者在耶律楚材等人的影响下,开始对汉文化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使得华北地区的教育出现了一个较好的发展势头。(国初)宣圣庙,太祖始置于燕京。当时人们采取了一个比较经济的办法,按照宣抚王楫的请求,把金朝的枢密院改为宣圣庙。太宗五年(1233年),初立四教读,以蒙古子弟令学汉人文字,仍以燕京夫子庙为国学。之后师儒、生徒的数量都有所增加,经济待遇也有所提升。

大蒙古国统治者于太宗十二年(庚子1240年)或太宗十三年(辛丑1241年)间,在燕都(今北京)设立太极书院。该书院的策划者是姚枢和杨惟中,授课的师儒主要是赵复和王粹。

大蒙古国所创建的学校不只限于蒙古地区和华北地区,在中亚地区也建立了相应学校。在唆儿忽黑塔尼别吉的资助下,伊斯兰教学校得到了兴隆,其教义得到了传承。

耶律楚材是大蒙古国时期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儒臣,他在文化教育方面做了许多实事。太宗始取中原,中书令耶律楚材请用儒术选仕,而且这项建议得到政府的采纳。太宗九年(1237年)秋八月,政府下诏命断事官朮忽歹与山西东路课税所所长官刘中,历诸路考试,以论及经义、词赋、论分为三科,作三日程,专治一科,能兼者听,但以不失文义为中选。其中选者,复其赋役,令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得士凡4 030人,免为奴者四之一。

大蒙古国时期,在哈刺和林这座具有草原特色的都城,宗教教育占一定的比重。蒙哥在位期间,即1254年夏,大蒙古国在哈刺和林组织了一场神学上的辩论。当时,蒙古统治者对所有的宗教都实施了比较宽容的政策,因而萨满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道教以及其他教派在哈刺和林都有一定的席位,且有大量的信徒。

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即大汗位,这标志着大蒙古国的政治中心开始南移。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早已把目标定位在中原及南宋所辖的广大汉地,他要当全中国的皇帝去统治各色臣民,这在客观上需要对原有的文化教育政策进行调整。为此他首先保护和发展的蒙古文化,其具体措施为确定了蒙古语的官方地位,颁行了蒙古新字,编译了蒙古文典籍。其次采行了汉法,其具体措施为加封孔子,推崇历代贤哲;行科举,为广大汉族知识分子的人仕提供了有效的路径;通过实施文化工程,造就了一批知名学者。再次出台措施广设学校,促进了各类教育的发展。据大司农司的统计报告,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诸路学校20 166所;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立学校24 400余所,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诸路所设学校21 300余所。

元代的宫廷教育,主要指蒙古帝王及其家族子弟的教育。这种教育也是在大蒙古国黄金家族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忽必烈建立大元帝国以后,宫廷里的皇子和皇太子的教育备受重视,设立了相应的机构,而且延聘了好多名师从事教学活动。他们一方面学习蒙古文化,另一方面也要学习汉文化——儒家经典,此外还要学习与佛学相关的藏文化。当时师儒们为便于皇太子的学习,编写了好多蒙汉文教材,主要有:《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帝范》、《世祖圣训》、《皇图大训》、《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孝经》、《大学衍义》、《尚书》等。此外,个别师儒还为皇太子编写了《端本堂经训要义》、《大宝龟鉴》、《承华事略》等课外读物,开阔了皇太子的视野。除了师儒的影响,皇子皇孙们更多地接受家庭的熏

陶,尤其是皇帝和皇后们对子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忽必烈和察必皇后对真金的影响特别明显,成了众人学习的楷模。另外伊利汗国合赞汗成长过程,也真实地反映了蒙古黄金家族教育的一个侧面。

除了皇子和皇太子的教育,在元代的宫廷教育里还包括皇帝本身的学习和教育。元代的帝王们都十分重视自身的学习问题,他们专门设立了御前讲席,选择名儒定期进宫,讲解经传史鉴,提高了自身的素养。蒙古皇帝的学习类似于今天的成人继续教育。当时人们把那些担任讲官的学者称为经筵,其任务就是结合儒家的经典,解答皇帝治理国家所遇到的疑难问题,提倡经世致用。每当这个时候,经筵讲官们充分发挥自身的特长,对军国大事发表自己的看法,进而通过影响皇帝制定并出台了一些利国利民的政策,同时也纠正了一些政策失误。在学习方面,元世祖忽必烈表现得最为出色,他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从未放弃学习。有时他在马背上听名儒讲经传史鉴,有时他请学者入宫里侍讲到深夜,而且其学习积极性特别高。元代的经筵讲课比较自由、灵活且与皇帝的交流有一定的针对性,重在解决问题,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在元代的中央官学里最著名的当属蒙古国子监学、国子监学和回回国子监学。虽说名称不同,但就生徒而言都属于蒙古族教育的范畴。其中蒙古国子监学、国子监学在师儒的选聘、生徒的选拔、陪堂生的配备以及学习内容和待遇,还有管理等方面都比较接近,属于同一类型的中央官学。上都分学的设置是元代中央官学的一大特色,它是两都巡幸制的一个产物。元代蒙古国子监学、国子监学所实施的升斋等第制、私试规矩制和黜罚科条制,对调动生徒的学习积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回回国子监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建立的一所外语学校,为中西文化的交流培养了一批合格的译史。

元代的诸路蒙古字学的发展与蒙古新字版型的推广有着密切的联系。元廷在各地,包括汉地在内都设立了蒙古字学,同时为它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研究表明,当时的诸路蒙古字学不仅招收了蒙古、色目生徒,而且也招收了相当数额的汉人、南人生徒,所学教材为用蒙古文译写的《通鉴节要》。需要指出的是,元代的诸路蒙古字学针对汉人、南人的蒙古语学习摸索出了一套成功的教学经验,并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

元代地方儒学的发展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甚至在很多方面都超过了前代,这些都证明了蒙古统治者对汉文化的重视程度。据史料记载,元代的地方官吏,尤其是蒙古官吏们为路府州县学校的发展,办了很多实事。他们为学校奔走呼号,特别是在修缮校舍、解决学田争端等方面秉公执法,实实在在地维护了学校的利益。

元代的医学教育以其超一流的水平,培养出好多顶尖级的医学人才。当时的医学教育之所以能够达到如此的程度,是因为多民族的文化交流为它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蒙医、藏医、回回医、阿拉伯医的加盟,为中医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的生机。当然医师们的临床实践、直观教学、解剖实验和科学研究,为医学人才的培养开辟了新路。此外科学的管理加速提高了医学人才培养的质量。

在一般人的眼里,元代的阴阳学或多或少带上了一些神秘的色彩。这是因为人们对该学所设的占算、三命、五星、周易、六壬、数学、婚元占才大义书、宅元周数秘奥、入宅通真论、莹元地理新书、莹元总论、地理明真论等科目,缺乏一定的了解。不过学者们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深入了解这一未知的领域。与儒学相比,元廷对阴阳学师儒的选拔、管理采取了较为严格的措施,甚至在特殊时期对阴阳人的言行进行了监控,防止他们编造讖语蛊惑人心。